

诸葛亮并非“重益轻荆”

张 大 可

《江汉论坛》一九八〇年第一期刊载了薛国中同志的《诸葛亮与隆中对》一文，提出诸葛亮没能完成统一大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荆州问题处置失当，犯了重益轻荆的错误。这一论点似与史实不符，值得讨论。

刘备进蜀之初，只命庞统随行，而让诸葛亮坐镇荆州。关羽、张飞、赵云、刘封、孟达等一班虎将及重兵都留守荆州，可见刘备集团对荆州是足够重视的。

按隆中对策，北伐中原，兴复汉室，不仅要占有荆州，还必须占有益州，首先完成鼎足三分的霸业。“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显然是以益州作为巩固的根据地的。所以当庞统战死雒城，三军夺气，情况危急之时，诸葛亮不得已亲自援蜀。况且当时严重的危险还是来自北方。曹操已平定雍、凉，正窥伺汉中。若果益州久持不下，曹操军来，则非刘备所有。在这种形势下，诸葛亮入蜀，赶在曹操平定汉中之前占有益州，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决定。不久曹操就夺取了汉中，“蜀中一日数十惊”（《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薛文引王夫之说“取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余，而不必武侯也”，这是不符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薛文说，诸葛亮带兵入蜀，“这一行动破坏了原来兵力的战略配置”，是“丢下荆州”，又责备诸葛亮在取得益州后没有回师

荆州，把住“入川的大门”，因此是重益轻荆。我们认为这些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把守大门是一将之任，治理蜀国非诸葛亮莫之能属。在刘备未得益州之前，荆州是立足之地，故须诸葛亮亲自坐镇。而当益州已为荆州后援，有一关羽留守就完全可以胜任了。关羽是蜀国上将，曹、孙双方都畏之如虎。公元二一五年，孙权来争荆州，只以索讨江南三郡为限，不敢正眼窥探关羽稳坐的南郡。公元二一九年，关羽北伐，一战而擒获于禁的步骑三万，使曹操震恐，议欲迁都洛阳以避其锋。这说明诸葛亮入蜀，让关羽留守是作了慎重的安排的，荆州主力也还在他的统领之下。

《隆中对》分析荆州是“用武之国”，而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是立国根本。薛文认为这个分析“已经包含着重益轻荆的思想萌芽”，在战略上是“错误”的。我们的看法与此相反，认为诸葛亮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在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刘备在未得益州之时，“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在战略位置上，荆州就是“用武之国”，四战之地，为刘、孙、曹三家所必争。倘若没有益州做为可靠后方，刘备没有回旋余地，难以立国。益州是立国根本，荆州是前进基地，轻重次序是客观存在，怎么能说是诸葛亮的主

观安排呢？按照《隆中对》制定的北伐计划，荆州之兵直向宛、洛，吸引曹魏主力，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秦川，就能够收到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效果。从战术上看，荆州之兵是主力，直插曹魏心脏，出秦川之师是侧翼配合。但从全局的进退来看，北伐不可能一战成功。所以在战略上，荆州之兵是用奇，出秦川之师是正，因这一路较易广境拓土。公元二二八年，诸葛亮一出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诸葛亮传》），完全应了《隆中对》的分析，就是明证。若果刘备一旦占有关中，则可迁都长安，居高临下东向以争天下，走高祖创业的道路。所以诸葛亮设计要刘备亲出秦川，命一上将出击宛、洛，呼应配合。因此益州得手后，诸葛亮驻留成都，着手兴创国家，刘备担当征伐之任，带兵在外，积极地实践隆中路线，这不能说是重益轻荆。

薛文为了证实诸葛亮重益轻荆，还提出了两个论据。其一是“夺取荆州时急躁冒进”；其二是诸葛亮使吴在会谈中“只着重分析各方军事实力，争取孙权全力抗曹，不提荆州归属问题”。薛文用这两个论据来证明诸葛亮缺乏全局的政治经验。果真如此，那诸葛亮的确是重益轻荆。但是薛文的论据不符史实。

《隆中对》精辟地分析了刘备不能与孙、曹争锋，只能从同姓手中夺地盘。公元二〇八年春，孙权从南边发起了争夺荆州的进攻，一举歼灭黄祖，七月曹操率师南下，也是来抢荆州。在南北夹击之下，荆州的平静被打破了，刘表被吓死，二子不协，内部分崩离析。在这种形势下，刘备夺取荆州，迫在眉睫。如果荆州一旦易手，无论属曹还是属孙，刘备再去争夺，岂不是与孙、曹争锋？但是以兴复汉室为号召的刘备向同姓夺地盘，必须讲究策略才能使人心归附。当刘琮投降曹操之后，诸葛亮劝刘备攻琮，名正言顺，说“荆州可有”，这是一个大好时

机，刘备立即采纳了。但是在夺取方法上刘备与诸葛亮有所不同。诸葛亮建议攻琮，夺取襄阳，迟滞曹军南下，从容不迫地去占有江陵的军实，在军事上这是最有利的。刘备则主要是争取人心归附上来考虑，他命关羽率水师奔赴夏口，自己径直去取江陵。刘备过襄阳数刘琮之罪而释之，把这个累赘留给了曹操，政治上获得了信义昭著的美名，果然最大限度地争取了人心。“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刘巴传》）。但是刘备的上述计划落了空，在当阳长坂被曹操追及，一败涂地，失去了联吴的资本，若不是鲁肃到来，刘备只好远遁江南了。薛文说，由于刘备“没有采纳”诸葛亮的建议，“结果刘琮降曹，让曹操占领了荆州”，把诸葛亮的建议说成是在刘琮降曹之前提出的，这是不符史实的。

本来孙权是要夺取荆州的，但由于曹军南下，以鲁肃为首的主战派立即转向与荆州结盟。因此薛文推论，“若按诸葛亮的意见抢先占领荆州，刘备必然是损兵失地，一无所得，只有利于曹操”，这种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曹操不战而下荆州，声势大振，水陆俱进直取江东。当时刘备有精甲二万，文有诸葛，武有关、张、赵云，又是荆州人望，这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孙权要阻挡曹操东进，必须联合刘备这支力量。所以孙权说：“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刘备新败之余，要夺回荆州，没有东吴作后援，那是梦想。曹操的东进，促成了孙、刘两家的联合。诸葛亮使吴，达成了鼎足三分的双边同盟。孙、刘双方承认鼎足三分，荆州的归属自然解决。诸葛亮说：“今将军（孙权）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于是“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诸葛亮传》）鼎

足三分是刘、孙联盟的前提。如果孙权不答应这一条件，刘备宁愿远遁苍梧作田横，也决不作附庸。大敌当前，孙权不得不作让步，同意鼎足三分，打败曹操，荆州归刘。所以《三国志》的《蜀书》、《吴书》各传凡提及赤壁之战，都说“并力”“俱进”，而《魏书·武帝纪》直接说成是曹、刘之战。赤壁战后，周瑜率军在南郡作战，把江南诸郡让刘备去收拾，孙权没有派一兵一卒去争夺这些地方，而是转攻合肥。后来鲁肃都督荆州，劝说孙权把南郡也借给了刘备。薛文含糊其词地说“刘备取得了荆州”，只字不提借荆州，用以掩饰“不提荆州归属”的论点，完全不符史实。事实上正是由于诸葛亮的高瞻远瞩，孙权的恢宏大度，双方正确处理了荆州的归属，才结下了联盟，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奠定了鼎足三分的基础。

那么荆州又是怎样丢失的呢？直接责任在关羽。他“刚而自矜”，小视孙吴，经常制造边境磨擦，鲁肃“常以欢好抚之”（《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孙权联姻，他“骂辱其使”（《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他围襄樊，擅取吴国的“湘关米”（《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这成了孙权进兵的导火线和借口。对内，关羽没修好政理，不能存恤百姓，为吕蒙所利用。他“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不能团结部属。南郡太守麋芳，屯公安的将军士仁，“素皆嫌羽轻己”。关羽出师，他们供给军资又不及时，“羽言还当治之”。于是“芳、仁咸怀惧不安”，“使人迎权”（《关羽传》）。最后，关羽轻躁北伐，直接导致了荆州的丢失。按隆中路线，北伐条件，第一要东联孙吴，无后顾之忧；第二要天下有变；第三要有出击秦川的配合。这些条件一个都不具备，关羽就冒险北伐，屯兵于坚城之下，不亡何待？更有甚者，当曹操派徐晃援助襄阳，又将孙权的“讨羽自效”的书信“以弩射示羽”时，他还犹豫不能去。这时陆逊的一封卑下书信竟

麻痹了关羽，使他“意大安，无复所嫌”（《三国志·吴书·陆逊传》），“稍撤兵以赴樊”（《吕蒙传》），给孙吴留下了一座空城。驻防宜都的孟达又被刘备调去取上庸，蜀国君臣都达到了利令智昏的程度。

但是，丢失荆州最根本的原因是三国鼎立形成过程中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造成的。荆州是刘备北伐中原的前进基地，蜀国“得则保其疆域，失则只成乎坐困”，位置十分重要。荆州地处吴国上游，是它立国的门户。吴国得不到荆州，在同盟中只能当配角，所以它是要尽全力来争的。这就是当时斗争的总形势。一纸同盟条约怎能掩盖这生存攸关的利害冲突？公元二一五年，刘备若不以武力去争江南三郡，他本来可以早得汉中，增强实力，吴、蜀同盟的破裂也不至于如此之快。孙权尚能借荆州给刘备，刘备取得益州后不主动去谈判，却用武力去争江南三郡，在政治上是失计的，诸葛亮也有责任。《隆中对》的路线是东联孙吴，北伐中原。而刘备为了区区三郡与孙吴兵戎相见，破坏了联盟。可见刘备未能很好执行隆中路线。“贪而弃义，必为祸阶”（《鲁肃传》注引《吴书》）。鲁肃这话，很有道理。

荆州一失，兴复汉室成了泡影，隆中对策的路线行不通了。所以诸葛亮六出祁山，并没有直趋秦川，而是绕道西出，蚕食魏境，以攻为守罢了。

综上所述，荆州失守并不是隆中对策萌芽了重益轻荆的祸根，而是当时斗争形势的发展导致隆中路线未能很好执行。刘备两次争荆州都是失计的。正确的路线还必须正确地去执行。任何完善的计划都不能包容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的实际发展，只能因势利导，去争取胜利。关羽的北伐和曹操发动赤壁之战一样，都是在条件不成熟时的轻躁冒进，都是在发展顺利的形势之下丧失了理智的表现。从这个意义说，三国纷争的历史也是值得认真总结的。